

蘇俄經濟五十年

呂 律

壹

今年的十一月七日，就是蘇俄十月革命五十週年。

這個日子，對於蘇俄及其他共產國家而言，固然是一個值得盛大紀念的日子，即對我們自由世界而言，因為自十月革命以來，人類的和平生活秩序就多了一種威脅，所以也有加以檢討的必要。

十月革命既以實行共產主義為其標誌，則十月革命五十週年紀念，也就是應該為共產主義制度在俄國大地上實驗半個世紀作一總結的日子。

所謂共產主義，馬克思把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共產主義，是為共產主義建立物質技術基礎的一段，通常稱為社會主義階段；第二階段，馬克思稱它為「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其特徵是社會已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蘇俄過去五十年所實行的共產主義，無疑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在這個階段之中，又分為「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及「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兩個階段。

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八年底，即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止，一共是二十年，根據蘇俄自己的劃分是屬「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但是，這個二十年當中，又可分為三個時期，即戰時共產主義時期、新經濟政策時期和五年計劃時期。在這三個時期當中，俄共為了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新體制和社會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曾經採取下述一系列重要措施：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實行私營銀行國有化；
一九一八年二月三日宣佈沙皇及臨時政府發行之公債一律作廢，二月十

九日公佈「土地社會主義化基本法令」，四月實行對外貿易國有化，列寧發表「四月提綱」，六月廿八日實行大型工業國有化；

一九一九年三月聯共（布）第八次大會通過俄共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黨綱；

一九二〇年，列寧建議成立俄羅斯全國電氣化國家委員會；

一九二一年三月八—一六日，聯共（布）第十次大會完成蘇俄經濟政策的歷史轉變，改行新經濟政策；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聯共（布）第十四次大會最後決定國家工業化為爭取社會主義勝利鬥爭之總路線；

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因農業發展速度落後，聯共（布）第十五次大會根據列寧合作化計劃標榜農業集體化方針；

一九二九年五月，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批准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九二八—一九三二年），六月五日聯共（布）中央及勞動與國防委員會通過「組織機器拖拉機站」決議；

一九三〇年三月，公佈農業勞動組合同章程；

一九三四年一月，聯共（布）第十七次大會通過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年）。

蘇俄的國民經濟計劃推行到一九三七年第二個五年計劃終了，據總結顯示，蘇俄的工業在歐洲佔第一位，在全世界佔第二位；農業集體化業已基本完成，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戶已佔全國總農戶的九三%。——據宣佈：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已基本完成。

蘇俄第三個五年計劃（一九三八—一九四二年）是標誌蘇俄從社會主義

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第一個計劃。雖然它推行到一九四一年六月被希特勒的砲火擊破，不能再繼續下去，經過一段長達四年的戰時經濟時期，在這四年當中所有以前在恢復時期（一九一八—一九二七）及第一個和第五個五年計劃時期（一九二八—一九三二和一九三三—一九三七）獲致的成就，幾已破壞殆盡，但是從戰後第四個五年計劃起，蘇俄的經濟並不是從頭做起，而是在原有的基礎上繼續向共產主義過渡。關於這一點，我們祇須注意下述的一些政策措施，即可知其大概：

一九三九年三月聯共（布）第十八次大會批准第三個五年計劃（一九三八—一九四二年），這個計劃標榜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

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七日，聯共（布）中央與蘇俄人民委員會通過決議，撤退設備、機床、機器、工人、工程技術人員及其他居民；

一九四三年八月廿一日，聯共（布）中央與蘇俄人民委員會通過「關於恢復解放區經濟緊急措施」之決議；

一九四五年夏秋之交，開始實施向平時建設過渡的措施；

一九五二年十月五—十四日聯共（布）舉行十九次大會，批准「蘇俄一九五〇—一九五五年發展國民經濟第四個五年計劃」指示；

一九五三年九月，俄共中央全會，通過「進一步改進農業措施」；

一九五四年二—三月俄共中央全會，通過「開墾生荒地與熟荒地措施」；

一九五六年二月，俄共第二十次大會通過「蘇俄一九五六—一九六〇年發展國民經濟第六個五年計劃」指示；

一九五六年三月，俄共中央與蘇俄部長會議通過「勞動組合章程」、「建議集體農民修改和補充有關宅旁園地及飼養牲畜數目的規定」等決議；

一九五七年五月，蘇俄最高蘇維埃大會通過「進一步完善工業和建設管理組織法」，並規定自是年七月一日起實施；

一九五八年五月，蘇俄最高蘇維埃大會通過「改組機器拖拉機站」之法令；

一九五九年一月廿七日俄共第廿一次代表大會通過「蘇俄一九五九—一九六五年發展國民經濟控制數字」（即七年計劃），此次大會標榜已進入開展共產主義運動時期；

一九六一年十月俄共第廿二次大會通過俄共新綱領（即俄共二十年之遠

景經濟計劃）；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俄共中央全會通過省、邊疆區黨與蘇維埃組織劃分為工業黨部與農業黨部及省工業蘇維埃與省農業蘇維埃；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俄共中央全會通過「合併各省、邊疆區農業黨務機構及蘇維埃機關」案；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四日，俄共中央全會通過「進一步發展農業緊急措施」；九月，通過「改進工業管理、完善計劃工作、及加強工業生產經濟刺激」案（即經濟改革案）；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俄共中央與蘇俄部長會議公佈「關於國營農場及其他國營農業企業向徹底的經濟核算制過渡」。

我們根據上述蘇俄五十年來在建設社會主義階段上戰前戰後各不同時期所採取的一些重大措施看來，所謂「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和「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祇不過是要解決兩個問題而已：一個問題是「誰戰勝誰」，另一個問題是完成「蘇俄基本經濟任務」——即在最短的歷史時期內使產品的產量按人口平均計算趕上並超過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也就是美國。

貳

蘇俄在過去五十年當中是不是已經解決了「誰戰勝誰」的問題呢？當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四日聯共（布）召開第十八次代表大會莫洛托夫報告「蘇俄一九三八—一九四二年發展國民經濟第三個五年計劃」時，對於這一點作了答案。他說：

「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歷史任務已經完成了，——一切剝削階級都已完全消滅了，那產生人剝削人現象和劃分為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種種原因，也永遠剷除了。所有這一切，首先是由於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結果。」接着他說：

「我們在一九二八年時的情況，工人和職員佔居民社會成份的一七%，集體農民——三%，個體農民與未合作化的手工業者——七三%，資本主義份子——五%，其他居民（即學生、軍隊、領撫卹金者等）——二%。」「現在我們的狀況已經完全不同了，一九三七年蘇俄居民的社會成份是：工人與職員佔居

民總額的三五%，集體農民（連同合作化的手工業者）——五五%，個體農民與未合作化的手工業者——六%，其他居民（學生、軍隊、領撫郵金者等）——四%。由此可見，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末，百分之九十四的居民，是在社會主義經濟——國營經濟和集體農莊公有經濟——中工作的工人、職員和農民。個體農民和未合作化的手工業者，大約百分之六。剝削份子已被消滅，已在我國地面上絕迹了。」

莫洛托夫這段報告，起碼犯了兩大毛病：在時間上既嫌過早，而在程度上又近於欺人自欺。

所謂「誰戰勝誰」，有廣狹二義。莫洛托夫的報告，是採狹義主義——即誰在國民經濟中居統治地位，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根據統計資料顯示，當時蘇俄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已居統治地位。於是莫洛托夫便宣佈社會主義已戰勝了資本主義。其實，社會主義這種統治地位的形成，並不是順乎自然的發展而成的，乃是從暴政與暴力之下產生的，是靠不住的。列寧說過：「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中，我們主要的敵人，是小資產階級，是它的風尚、習慣和經濟地位。」到一九三七年底為止，雖然小資產階級在蘇俄國民經濟中業已喪失掉它的經濟地位，但是它的風尚和習慣却並未隨同他們的財產一併而去，他們隨時隨地都在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法令的漏洞和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弱點——從事「破壞」活動。

所謂「破壞」活動，在過去五十年，不僅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無日無之而無地無之，而且在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中，與日俱增和愈演愈烈：

一、據一九六五年六月「經濟問題」透露：計算和調查表明，在蘇俄東部地區勞動力不足的同時，在某些地區却有為數不少不參加公有生產的有勞動能力的成年居民。一九五九年，從事個人副業的集體農民和職員的家庭成員人數為九九〇萬人，此外，從事家務的人估計達一、二八〇萬人，佔全國勞動力的二七·七%。七年計劃初期，從事個人副業、不參加公有生產的有勞動能力的居民，在蘇俄平均為二〇%，在西伯利亞則達到二六%，在北高加索有約為五分之一。

二、最近，蘇俄「統計通報」（一九六七年第一期第三〇—三四頁）刊登一篇論集體農莊市場的文章，據透露，一九六五年每月平均有一、七〇〇

萬人以上在集體農莊市場上出賣自己的產品，顧客當然還要多得多。到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五日為止，有七、二六〇個集體農莊市場，其中在城市及城市型的村鎮中有五、〇五三個，在各省、邊疆區和共和國首府者有九六〇個，在農村地區有二、二〇七個。

上述兩個使莫洛托夫一九三九年的報告慚愧無地自容的典型事例，並不是目前才有，在四十餘年前也有，但是規模和影響却絕無今天這樣大。所以，小資產階級的風尚和習慣在今天的蘇俄社會中，遠較一九三九年前後為甚。從狹義主義看蘇俄「誰戰勝誰」的事業，在過去既未做到澈底勝利，到現在，差不多可以說業已失敗了。

就廣義方面來說，「誰戰勝誰」就不限於那一種經濟成份在國民經濟中居統治地位和小資產階級的風尚習慣是否存在問題了，來自蘇俄國境以外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影響，也要計算在內。

從蘇俄國民經濟發展史看下來，外國的資本打入蘇俄經濟，在過去五十年當中會有過兩次紀錄：第一次是在戰時共產主義失敗以後，列寧毅然決然採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當時，俄共黨內有人反對列寧放棄共產主義作一百八十度大轉灣再回到資本主義的政策——將工礦等企業租給外國資本家經營。列寧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在全俄政治教育局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報告「新經濟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務」時，說明它所以要走這條道路的道理說：

「由於我國在帝國主義戰爭結束時似乎已經陷於絕境，由於這些以及許多其他情況而犯了錯誤：決定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生產和分配。當時我們認定，農民按照餘糧收集制交出我們所需數量的糧食，而我們把這些糧食分配給各工廠，我們就可以實行共產主義的生產和分配了。」但是，他說：

「經過一段不很長的試驗時期，終於使我們相信，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是同我們以前所說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言論相抵觸的。那時我們認為，不經過一個實行社會主義的統計和監督時期，即使要走上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也是不可能的。」

列寧進一步說：「我們新經濟政策的實質正在於我們在這方面遭受了嚴重的失敗，開始作戰略上的退却。」「新經濟政策就是以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轉到恢復資本主義。究竟恢復到什麼程度，我們不知道。同外國資本家訂立的租借合同和私人資本家的租借，都是直接恢復資

本主義，都是同新經濟政策的基礎有關的。」接着列寧又說：

「目前整個戰爭要解決的問題是：誰將取得勝利，誰能更快地利用目前形勢，是我們從一個大門甚至於好幾個大門放進來的資本家呢？還是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全部問題就在於誰跑在誰的前面？資本家如能先組織起來，他們就會把共產黨人趕走，那就什麼也不用談了。必須冷靜的來看看這些事情：誰戰勝誰？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是不是能够依靠農民，對資本家老爺加以適當的限制，把資本主義納入國家軌道，建立起一種受國家領導的並為國家服務的資本主義呢？必須冷靜的提出這個問題。」

結果，新經濟政策的戰略退却，雖然不出列寧的所料，為蘇俄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了前提，但是，這種勝利，在今天評判起來，俄共當時在物質上所得到的，在統計上所展示出來的，看上去似乎是非常悅目，其實在思想意識上所受的影響，其損失遠比在物質上所得到的為多。

事實證明，在四十餘年以後，蘇俄必須為了挽救它的經濟危機（也就是為了徹底戰勝資本主義）再一次採用資本主義經營的方法，並且廣泛吸收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開發它自己無力開發的資源和經營它自己的技術水準無法經營的企業。

一九六五年九月俄共中央全會通過的「經濟改革案」，從背景、方法和目的上看來，無異是新經濟政策的再版，更明白一點說，就是蘇俄要再一次用資本主義的方法，挽救本身的經濟危機，進而擊敗資本主義。

蘇俄自一九六六年起，不但在工業、建築業、運輸業、商業等方面由小而大、由近而遠實行經濟新體制，而且自本年起更擴展到農業部門，一個從列寧以來最感棘手的部門。

蘇俄不但在其國民經濟各部門依照新體制改造它的經濟，而且鑒於本身缺乏充分的資本和進步的科學技術，又重演其四十餘年以前的故技，吸收外國資本發展其「社會主義經濟」：

一、據日本方面的報紙在本年春季透露，蘇俄已經具體提出歡迎日本投資開發西伯利亞的計劃。此項開發計劃要求日本在下列一些建設項目上投資：（一）鋪設長達七、七六〇公里的輸油管；（二）開發西伯利亞森林資源；（三）擴建遠東港口；（四）開發北庫頁島天然氣；（五）開發東西伯利亞地區的銅礦；（六）開發鹽岩、鉀鹽、磷礦、和螢石。

二、據共匪「人民日報」一月廿三日報導：蘇俄對外貿易機構在「紐約時報」刊登兩頁地位之廣告，大肆招攬美國資本家在蘇俄刊物、電台及電視節目上刊登廣告，以增進同美國企業家之關係。

三、四月二十二日「法新社」羅馬電稱：義大利商務部長托萊在接見報入時談稱，義大利「快意」汽車廠將在蘇俄製造價值八千萬美元之汽車，該廠將設在烏克蘭。

現在的問題是：蘇俄為什麼一而再，也可能再而三的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方法和技術恢復它的經濟，等到它的經濟恢復到可以不依賴資本主義的時候反過來再剷除資本主義的因素和影響呢？一言以蔽之，它要完成它的基本經濟任務——在產品的產量方面按人口平均計算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就是美國。

叁

「完成蘇俄基本經濟任務」這個口號，最初是列寧提出的：一九一七年九月，列寧在他所著「大難臨頭，出路何在」一書中寫道：「革命已經做到的，是俄國按其政治制度來說，在幾個月以內就趕上先進國家了。可是還不夠。戰爭是鐵面無情的，它用毫不容情的嚴厲方式提出問題：或是滅亡，或是在經濟方面也趕上并超過各先進國家……或是滅亡，或是開足馬力向前猛進。歷史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

後來，列寧這個口號得到史達林和黑魯曉夫在不同時期分別加以發揮：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史達林在聯共（布）中央全會發表「論國家工業化和聯共（布）黨內的右傾」演說時，他說：「……我們是在一個技術非常落後的國家內取得了政權的。」「我們周圍有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它們擁有比我國發達得多的和現代化的工業技術。」「由此可見，一方面，我國有最先進的蘇維埃制度和全世界最先進的政權，即蘇維埃政權；另一方面，應當作為社會主義和蘇維埃政權的基礎的我國工業技術却過份的落後。」「要克服這種矛盾必須做些什麼呢？為此必須趕上并超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我們在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即蘇維埃制度方面已經趕上并超過了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但是還不夠，為了在我國取得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還必須在技術和經濟方面趕上并超過這些國家。或者我們達到這個目

的，或者我們被壓倒。」

經過一年多以後，聯共（布）中央向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七日舉行的第十六次大會提出政治報告時，史達林報告大會說：「我們正加速前進，將要在經濟方面和技術方面趕上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接着他強調指出：「這并不是說我們在產量方面已經趕上了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并不是說我國工業已經達到了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發展的水平。不，還遠不能這樣說。不能把工業發展的速度和工業發展的水平混為一談。認為我們達到空前的工業發展速度，那麼我們也就已經達到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發展水平，這是根本不對的。」

給蘇俄基本經濟任務下一個明明白白的定義，使人有一個清清楚楚的概念，是史達林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為第一個五年計劃所作的總結。他對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所作的歸納，可供我們了解蘇俄基本經濟任務的參考：

——要把一個落後的、往往是中世紀的技術的國家引上現代新技術的軌道；

——要把蘇俄由一個任憑資本主義國家擺佈的軟弱的農業國變為不受資本主義國家擺佈的完全獨立的強盛的工業國；

——要把蘇俄變為工業國家的同時徹底排擠資本主義份子，擴大社會主義經濟形式的戰線，建立起在蘇俄消滅階級和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

；

——要在蘇俄創立一種不僅能把全部工業、而且能把運輸業和農業都按社會主義原則進行改造和改組的工業；

——要把分散的小農業引上大規模集體經濟的軌道，從而保證社會主義在農村中的經濟基礎，并以此消滅資本主義在蘇俄恢復的可能性；

——要在蘇俄創造一切技術上和經濟上的必要前提來最大限度的提高國防力量，從而能够徹底打退所有一切外來的軍事干涉的企圖，澈底打退所有一切外來的武裝侵犯的企圖。

史達林進一步說明這個基本任務以什麼理由為根據，以及由什麼決定的。他認為理由有四：

一、必須消滅使蘇俄處於難堪地位上的技術和經濟的落後性，必須在蘇

俄創造一種使蘇俄在技術和經濟方面不僅能够趕上而且過一個時候能够超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前提；

二、蘇維埃政權不能長久的建立在落後的工業的基礎上，祇有不僅不遜於、而且過一個時候能够超過資本主義各國工業的現代大工業才能成為蘇維埃政權真正的和可靠的基礎；

三、蘇維埃政權不能長久的建立在兩個對立的基礎上，建立在消滅資本主義份子的社會主義大工業上和產生資本主義份子的個體小農經濟上；

四、當農業還沒有建立起大生產基礎的時候，當小農經濟還沒有聯合為大規模集體經濟的時候，資本主義在蘇俄恢復的危險，是一切可能的危險中最現實的危險。

不過，第一個五年計劃并不是蘇俄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計劃，所以它所負的任務，祇是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一些基本任務，而不是趕上和超過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經濟任務。正式負有實現趕上和超過資本主義國家這個目標之使命的，是蘇俄發展國民經濟第三個五年計劃（一九三八—一九四二年），所以當莫洛托夫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四日舉行的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報告本案時說：

「按我國工業發展速度來說，我們確實已趕上并超過了資本主義國家。按生產技術來說，我們確實也趕上并超過了這些國家。所有這兩個成績，都有巨大的意義，但這還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在經濟方面，即在按人口計算的工業產量方面，我們畢竟還是落後於某些資本主義國家……關於這一點，無論如何也是不可忘記的，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滿足于自己的成績。」

進一步，莫洛托夫指出：「在蘇俄，社會主義已經建成了，但只是在基本上建成了，我們還必須做很多很多事，以便真正保證蘇俄有一切必需的東西，使我國能充分生產一切商品，使我國富有一切食品，以便不僅在技術方面、而且在經濟方面也把我國提高到不僅不亞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而且比它們高得多的水平。」

莫洛托夫強調說：「我們已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已進入由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期。然而，這個到共產主義的過渡，就是說一切產品都很豐富，而我們現在離這種豐富程度還很遠。這個共產主義的過渡，就是說

國家的技術經濟水平已是這樣高，以至於遠遠超過任何一個在經濟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現時的水平。」

最後他說：「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夕就已經說過的我國的基本經濟任務，已是全盤提出的時候了。實際着手解決蘇俄基本經濟任務——在經濟方面也趕上并超過歐洲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和美國——的時候，已經到來了，并且是在最近時期內徹底解決這個任務。一經解決了這個任務，我們就把蘇俄變成在各方面都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不僅是在政治方面……我們要使蘇俄在經濟方面也佔世界第一位。那時，蘇俄發展中的新時代——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時代意義，才會真正顯露出來。」

但是，蘇俄第三個五年計劃的美夢，做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就給希特勒的砲火擊破了。從此，經過一個長達四年的戰爭時期和戰後第四和第五個五年計劃的恢復時期，也就是說，自一九四一年六月德蘇戰爭爆發後經過約十五年的期間黑魯曉夫才再彈此調。

終黑魯曉夫之任，他在具有歷史性的文件上提出解決蘇俄基本經濟任務的言論，前後有過三次：第一次是俄共第廿次大會（一九五六年二月）報告第六個五年計劃；第二次是俄共第廿一次大會（一九五九年一月）報告七年計劃；最後一次是俄共第廿二次大會（一九六一年十月）報告俄共新綱領。自史達林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到黑魯曉夫在俄共新綱領中所提出的，前後雖然同是一個口號，但是比較起來，黑魯曉夫所提的已較史達林時代有了很大的進步，他注意到在人民生活方面也要趕上和超過美國。

黑魯曉夫在俄共第廿次大會報告時指出：「現在蘇俄有一切必要條件可以在和平的競賽中，在最短的歷史時期內解決蘇俄的基本經濟任務。」我們知道，蘇俄的第六個五年計劃行到一九五八年中斷，繼之而起的是七年計劃。於是，黑魯曉夫在俄共第廿一次大會上報告七年計劃時指出：「七年計劃完成以後，將在實現蘇俄的基本經濟任務方面，即在最短的歷史時期內在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品產量方面趕上并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方面，邁出決定性的一步。」接上來他分析說：「在同資本主義競賽的第一階段（從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始），列寧提出的「誰戰勝誰」的問題，在我國已經以社會主義的勝利而得到解決了。……現在我們正在進入同資本主義進行經濟競賽的新階段。現在的任務是，爭取社會主義體系在世界生產中壓倒資本主義

體系，在社會勞動生產率 and 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品產量方面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保證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

黑魯曉夫更具體強調指出：「在競賽的這一階段，蘇俄打算在經濟方面超過美國。美國在生產水平方面是資本主義經濟所能達到的極限。超過美國的水平，這意味着超過資本主義的最高指標。」

俄共第廿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新綱領（即俄共第三個黨綱），就是蘇俄建設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二十年的遠景計劃，它在字裏行間所流露的誇大和不自量力，完全符合黑魯曉夫的性格。這個綱領關於解決蘇俄基本經濟任務的規定是：「黨和蘇俄人民的主要經濟任務，是在兩個十年的時間裏建立起共產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這就是說：使全國電氣化和在這個基礎上完善工業的技術、工藝規程和社會生產組織；使生產過程全盤機械化和愈來愈自動化；在國民經濟中廣泛運用化學；大力發展經濟效果高的新的生產部門、新的能源和材料；全面的、合理的利用自然資源；把科學同生產有利的結合起來和使科學技術高速度的進步；勞動者要具有高度的文化技術水平；在勞動生產率方面要大大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樣，蘇俄將擁有空前強大的生產力，超過最發達國家的技術水平，并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量方面佔居世界第一。」

新綱領所指的「兩個十年」，即「在最近十年（一九六一—一九七〇年）裏，蘇俄在建立共產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時，在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量方面將超過最強大的最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在第二個十年（一九七一—一九八〇年）裏，將建立起共產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全體居民將得到豐裕的物質的和文化的財富……」。也就是說：蘇俄擬定工業品產量的增長，在最近十年內大約增長一倍半，並將超過美國目前的工業生產水平；在二十年內不少於五倍，並將遠遠超過美國目前工業總產量。農產品的總產量，在十年內要增加一倍左右，而在二十年內要增加兩倍半——即在頭十年內蘇俄將在按人口平均計算的主要農產品產量方面超過美國，而在二十年內使一切農產品的產量遠遠超過美國。在人民生活方面，蘇俄新綱領保證比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都高。

但是，事實上做到了沒有？能不能做到呢？
首先，我們必須指出，負有實現此項任務的七年計劃，業已徹底失敗。

據蘇俄科學院一位亞岡比揚院士一九六五年在莫斯科發表的談話說，自一九五九—一九六四年的六年內，蘇俄的經濟成長率下降了三分之二，農業方面的成長率下降更甚，大約下降十分之九，從每一年的八%跌到〇·八%。

其次，蘇俄自進入七年計劃以後，經濟上的危機逐漸形成，於是爲了如何克服此項危機的問題，自一九六二年九月以後展開一場經濟改革的論戰，最後革新派佔了上風，一九六五年九月俄共中央全會通過以李柏曼教授的建議爲基礎的「改進工業管理、完善計劃工作及加強工業生產經濟刺激案」。事實作了有力的證明，即假如蘇俄的七年計劃和新綱領所計劃的，一切切合實際，斷無不受到人民支持終於落空之理，一種符合人民願望的科學設計亦斷無引起經濟危機的可能。現在，客觀的需要要求將一九二一年實行過、同時被認爲有效的新經濟政策再翻版一次，足見七年計劃和新綱領的大言爲事實所否定了。

同時，我們知道，所謂新綱領，是包括七年計劃中的五年（一九六一—一九六五年）再加上三個五年計劃的二十年遠景計劃，七年計劃結束以後，代之而起的新五年計劃當屬新綱領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它有義務有責任爲實現新綱領而努力。但是，新五年計劃的指示，并未再強調解決基本經濟任務的重要性。這一點證明蘇俄已知難而退，不再徒託空言，徒受國內外有識者的訕笑。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布星涅涅夫與柯錫金在個人的性格與作風上，與黑魯曉夫截然不同，他們雖然沒有再強調「趕上和超過」的「雄心」，可是毅然決然採取經濟改革的措施，寧肯忍受西方經濟學人的冷嘲和毛共宣傳的熱罵，逐步擴大加深改革工作，這比黑魯曉夫高叫「在最短的歷史時期在產品的產量按人口平均計算趕上并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或許更具積極性與現實性，亦未可知。

肆

總之，如果我們把共產主義拋開不談，祇就蘇俄經濟建設的表面而論，它在過去五十年不能說沒有成就，而且成就很大。不過，因爲它畢竟是一個共產國家，它的經濟制度是建立在馬列主義的教條上，如果嚴格的根據馬列主義加以檢討的話，則它在過去五十年的努力是失敗了。——它既未解決「

誰戰勝誰」的問題，也未解決蘇俄「趕上并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任務。

「誰戰勝誰」和「趕上并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並不是兩個問題，是一個，是一個目標之下的兩個做法。——「誰戰勝誰」具有全面性，包括消滅國內資本主義勢力、現象和因素及克服來自國外的資本主義壓迫和影響；「趕上并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則具有局部性，不論國內的資本主義現象和因素是否已經消滅，而在技術上和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品產量上力求趕上并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兩種做法比較起來，如果將注意力集中在解決後一個問題上，則有欺人自欺和本末倒置之弊。

根據馬列主義的教條看來，所謂「誰戰勝誰」的問題，是共產主義在社會主義階段必須徹底解決的一個基本問題，這個問題解決的不徹底，即社會主義階段不能被認爲已告結束。所以，社會主義的建設，是一個很長很長的階段。它既不是第一個和第二個五年計劃九年的功夫可以解決得了的問題，也不是五十年或一百年的時間足可够用的。

蘇俄的政治經濟學上說：「祇要在經濟中，除社會主義經濟外，還存在着小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那麼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的作用範圍就還受到限制。」

何謂「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我們從同一本書上知道，所謂「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它決定着社會主義生產發展的方向，它是社會主義經濟沿着共產主義的道路前進的規律。社會主義其他各種經濟規律與基本經濟規律不同，它們所決定的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某些重要方面的發展。因此，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生作用的經濟規律體系中，基本經濟規律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假如說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作用範圍不受限制，則據同書指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其他規律所決定的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優越性，使社會主義國家客觀上有可能性在經濟方面，即在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量方面趕上并超過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

由此可見，蘇俄自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來，高唱「趕上并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四十多年的時間內沒有得到解決，是它的基本經濟規律作用範圍受到限制，也就是「誰戰勝誰」的問題沒有解決，犯了本末倒置的錯

誤。

問題是蘇俄何時能澈底解決「誰戰勝誰」和「趕上并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根據前一個問題未得到解決，要解決後一個問題就受到限制的規律，敢於說，這不但是本世紀以內解決不了的問題，也是永遠解決不了的問題。

我個人所以要下這樣一個結論，理由非常簡單：首先，蘇俄國內拋開城市不論，祇就農村而言，在那裏存在着三個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集體農莊所有制和個人所有制。不論就馬列主義的教條、還是就俄共的新綱領而言，蘇俄的農村中不能永久建立在三個所有制的基礎上，它要向單一的全民所有制發展。問題就在這裏：俄共和蘇俄政府解決這個問題的手段是和平的還是強制的？採取和平的逐步解決的辦法，即從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入手，最後達到「消滅城市與鄉村的差別」的目的，使集體農民和單幹的個體農民放棄他們現有的一小塊土地，再使集體農莊從合作社集體農莊所有制昇華到全民所有制。這是一幅理想中的畫面，在現實生活中不一定有實現的把握。即使是實現了，還有一個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問題，這又是一個長期性不

中菲間第一懸案

逾期遊客問題

陳烈甫

一 中菲友誼年成功了一半

去年三月二十四日，中菲兩國元首，同時宣告「中菲友誼年」的開始。如果友誼年剛好是一年，就該於今年三月二十四日結束。後來爲着事實上的需要，就是完成位於馬尼拉黎薩國家公園中的中國花園的工程，以便移交菲

易得到解決的問題。即使是因俄共的努力經過一個很長很長的時間也解決了，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不是符合共產主義的要求？這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儘管俄共自廿二次大會以來力圖加強共產主義新人的教養工作，可是人是人，不是物。物可以用機器或用手工業製造得一模一樣，人和人的頭腦不可能。所以當蘇俄的共產主義實驗走到這一步時，就可能像列寧當日發現戰時共產主義的錯誤一樣，立即採取戰略退却的步驟。

假如說俄共和蘇俄政府爲求近功，迫不及待，捨和平逐步過渡的方式而不採，採取現實的強制方式，則蘇維埃政權可能在這第二度土地革命中被農民埋葬。因爲：蘇俄目前農村中的農民，既不是一九二八年以前的農民，更不是對於共產主義制度已有了習慣的農民，反之，他們在這五十年中對俄共和共產主義已有深刻而清楚的認識，他們已知道如何戰勝俄共的一切方法。

俄共除了在國內無法澈底解決「誰戰勝誰」的問題外，來自國外的影響，將更使俄共奉爲經典的馬列主義無法應付，因爲共產主義國家以外的世界，既然已不是馬克思列寧時代的老樣子，也不可能停在目前的階段和水準上一動不動，它們的前進，就是共產主義的困難，就是共產主義的後退。

政府，展延三個月，於六月二十四日結束。在結束這一天，菲總統馬可仕致詞，很巧妙的說：「去年三月二十四日，我正式宣告中菲友誼年的開始，今天我正式宣告中菲友誼永久存在的開始。」意思是說，今天並非中菲友誼的結束，而是中菲永久友誼的開始。當這位長於詞令的總統說完這句話，立刻引起聽衆如雷的掌聲。